

三唐兩宋攝其德 ——論《隨園詩話》中的唐宋詩調和論

王 怡 云*

摘 要

唐音宋調之別，自南宋以來便爭論不休，然自清代中葉，調停、調和之說應時而興，其中犖犖大者，應屬袁枚的《隨園詩話》。錢鍾書《談藝錄》云：「隨園論詩，深非分朝代、劃時期之說，重言申明」，足見反對「詩分唐宋」是袁枚詩論的一個重要主張。從清代詩學的發展觀之，袁枚對唐宋詩之爭的看法展現了清中葉唐宋融通思想的繁興之態。從袁枚自身的詩論主張來看，其調和唐宋之說更是其性靈說的一個具體呈現，其重要性可見一斑。然而，袁枚究竟如何掙脫唐宋門戶之見，進而能夠「存是去非」？此中是否也蘊含袁枚自身未現的「門戶之見」？这正是本文所欲探討的問題。為能更清晰地瞭解袁枚對於唐宋詩之爭的看法，本文是以袁枚的《隨園詩話》為主要探討文本，擴及其詩文集、尺牘等相關作品，藉以勾稽袁枚如何重新檢視，甚至試圖調和唐宋詩之爭的詩學主張，呈現袁枚如何在詩學論爭中取得融通的策略，進而能夠引領風潮，成為清代中期唐宋思潮融通的一個高峰。

關鍵詞：袁枚、隨園詩話、清代詩學、唐宋詩之爭、調和論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windy608kimo@yahoo.com.tw)

投稿日期：2013.10.19；接受刊登日期：2014.05.30；最後修訂日期：2014.10.27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Demarcation of Poetry within the Tang and Sung Dynasty: With the Analysis of *Suei Yuan Shih Hua*

Yi-yun Wang*

Abstract

The demarcation of poetry within the Tang and Sung Dynasty begins in Southern Sung Dynasty, and the reconciliation has arisen in middle period of Qing dynasty. *Suei Yuan Shih Hua* (隨園詩話) written by Yuan Mei is one of representatives in that time. Cian Jhong Shu (錢鍾書) once mentions that *Suei Yuan Shih Hua* is against the demarcation of poetry within the Tang and Sung Dynasty. Indeed, it is vital to find out how Yuan Mei tries to reconcile the debate of poetry, and also to research the reason behind the manner.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Yuan Mei's ideas, I not only research *Suei Yuan Shih Hua*, but also include his literary works like poetry, prose and letter, and hope to have a whole vision of his ideas about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demarcation of poetry within the Tang and Sung Dynasty.

Keywords: Yuan Mei, *Suei Yuan Shih Hua*, the poetics in Qing Dynasty, the demarcation of poetry within the Tang and Sung Dynasty, the reconciliation.

* Ph. D.,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Received October 19, 2013; accepted May 30, 2014; last revised October 27, 2014

壹、前言

錢鍾書（1910-1998）《談藝錄》云：「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¹錢鍾書先生以唐詩、宋詩是風格之別，而非僅是朝代之分，此已為今日學界之共識。唐音宋調之別，自南宋以來便爭論不休，然自清代中葉，調停、調和之說應時而興²，其中羣羣大者，應屬袁枚（1716-1797）的《隨園詩話》。袁枚為清中葉性靈派著名詩人，與沈德潛（1673-1769）主格調、翁方綱（1733-1818）倡肌理鼎足而立，《隨園詩話》正是其詩論代表作。袁枚對於盛行於世的唐宋詩論爭，有如是之見解：

論詩區別唐、宋，判分中、晚，余雅不喜。嘗舉盛唐賀知章《詠柳》云：「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初唐張謂之《安樂公主山莊》詩：「靈泉巧鑿天孫錦，孝笋能抽帝女枝。」皆雕刻極矣，得不謂之中、晚乎？杜少陵之「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妒紅花卻倒吹」；「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鈎」：瑣碎極矣，得不謂之宋詩乎？不特此也，施肩吾《古樂府》云：「三更風作切夢刀，萬轉愁成繞腸綫。」如此雕刻，恰在晚唐以前。耳食者不知出處，必以為宋、元最後之詩。³

袁枚具體舉出唐宋詩為例，表示盛唐詩可能有中、晚唐風格，杜甫詩中亦不乏宋詩特色，若單以朝代區分，則容易以偏概全，未見真貌。袁枚

¹ 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出版社，1999年），頁4。

² 齊治平，《唐宋詩之爭概述》（湖南：岳麓書社，1984年），頁112-119。

³ 袁枚反對唐宋詩之爭，另有一例為證：「詩分唐宋，至今人猶恪守。不知詩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國號。人之性情，豈因國號而轉移哉？」清·袁枚，《隨園詩話》，見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冊3（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234。

認為唐宋不僅是朝代之別，更有內容風格之殊異，此點正與錢鍾書之說相互發明：

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為稱謂之便。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則宋人之有唐音者。……夫人稟性，各有偏至。發為聲詩，高明者近唐，沉潛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⁴

身處清代中葉詩論百家爭鳴之時代，袁枚此說誠屬不易。袁枚之所以力主調停，乃是基於對唐宋詩論爭趨向意氣、偏頗之不滿：

前明門戶之習，不止朝廷也，於詩亦然。當其盛時，高、楊、張、徐，各自成家，毫無門戶。一傳而為七子；再傳而為鍾、譚，為公安；又再傳而為虞山：率皆攻排詆呵，自樹一幟，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處，各有乖謬處；總要平心靜氣，存其是而去其非。⁵

由此觀之，袁枚是從「門戶之爭」的角度來思考尊唐宗宋的議題：從明代前後七子之獨尊盛唐、鍾惺、譚元春之竟陵派，三袁之公安派，再至清初錢謙益（虞山）為反前七子而倡議宋詩，皆屬「攻排詆呵」，總有些意氣之爭的意味。事實上，唐宋詩之爭的議題，雖是由唐宋詩之評價而起，卻難免有門戶之見⁶，因而不能理性分辨詩學議題。袁枚主張「存其是而去其非」，正是希望藉此從門戶之見掙脫，回歸詩學議題的討論。袁枚對於唐宋詩之爭頗有力主調和、重新檢視的意味存在。從清代詩學發

⁴ 錢鍾書，《談藝錄》，頁 2-3。

⁵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2。

⁶ 有關清代唐宋詩之爭概況，可從袁枚〈答沈大宗伯論詩書〉：「大抵古之人先讀書而後作詩，後之人先立門戶而後作詩。」略窺端倪。詳參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見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冊 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284。

展的角度來看，作為清中葉性靈詩派主將的袁枚，如何在唐宋詩之爭的議題上體現其詩論主張？袁枚究竟如何掙脫門戶之見，進而能夠「存是去非」？此中是否也蘊含袁枚自身未現的「門戶之見」？此正是本文所欲探討的問題。

歷來對於袁枚重新檢視、調和唐宋詩之爭的專門研究，多是從宏觀或是概論的角度進行切入⁷。從清詩史的角度觀之，嚴迪昌認為，袁枚的詩論具有一種「現實針對性」，此種特性在其論唐宋詩之爭的主張中尤其顯著：「以『性靈說』沖洗宗唐祧宋風氣，可說是唯一的一劑妙方」⁸。換言之，袁枚是藉由矯正唐宋之分以表現其詩論主張，強調詩主性情，而無朝代之分。袁枚主張詩不分唐宋，正是著眼於此。張健曾言袁枚：「站在主性情的立場上說，詩歌是表現性情的，而性情是沒有所謂唐、宋之

⁷ 目前所見關注袁枚《隨園詩話》唐宋詩之爭的專門研究，見於齊治平《唐宋詩之爭概述》一書的「清代部分」。齊治平歸結袁枚對唐宋詩的見解，以為其「出入唐、宋，一以發抒性靈為歸；然論詩而標性靈、重情韻，則自近於唐而遠於宋。」詳參齊治平，《唐宋詩之爭概述》，頁 112。近人對清代唐宋詩之爭的研究，王英志編有《清代唐宋詩之爭流變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年），此書是將清代唐宋詩之爭的議題進行全面考索的著作，並將唐宋詩之爭的議題視為「認識清詩的一把鑰匙」（頁 1）。儘管唐宋詩之爭的議題值得探討，但目前研究尚待加強，王英志在總論中提到：「學術界對這一課題並未高度重視，專題論文尚不多見，史類著作或有涉及，但未作為專門問題進行集中與深入的研究。目前僅有 20 餘年前即 1984 年出版的齊治平先生的《唐宋詩之爭概述》一書。」（頁 1）然而，王英志認為此書尚有不足，偏向「概論」性質，在詩論的流變上關注較少。筆者則認為，此書探討範圍橫跨整個清代，專注在宏觀的流變上，在細部的探討上也就較為疏略。如袁枚對詩分唐宋的主張只有一小節，明顯不足。其他探討清初唐宋詩之爭的概況之單篇論文，可參張高評，〈清初宗唐詩話與唐宋詩之爭：以「宋詩得失論」為考察重點〉，《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學刊》期 1（2002 年 6 月），頁 83-158。又張高評，〈清初宋詩學與唐宋詩之異同〉，第三屆國際暨第八屆清代學術研討會，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主辦，2004 年 3 月 13-14 日，頁 87-122。

⁸ 嚴迪昌，《清詩史》冊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779。

分……詩歌的形式風格受性情的決定，人人不同，無所謂唐宋之別」。⁹從清代詩學發展的角度來看，袁枚對於唐宋詩之爭的見解，正反映當時性情與格調兩派之分岐¹⁰。事實上，唐宋詩之爭作為一個詩學議題，在清代詩學研究上已獲得相當關注，如張麗華便從清代唐宋詩之爭的流變進行觀察，將袁枚派入「乾隆後期至嘉慶朝唐宋融通思潮的空前高漲」的潮流之中，並以袁枚作為一個高峰，此後便是宗唐、宗宋、融合三派的相互競逐¹¹。張麗華更指出：「性靈派中對促進融通唐宋理論之完善與融通唐宋理論之實踐貢獻最大者當推其主將袁枚」¹²，又云：「力倡無分唐宋，也是袁枚等人宣揚性靈說的必然要求」¹³。可以說，袁枚對清代唐宋詩之爭的看法，不只與當時的詩學發展息息相關，更是其性靈詩說的展現。然而，袁枚詩論中所展現的「現實針對性」，需要透過更細緻的討論始能全盤得之。錢鍾書云：「隨園論詩，深非分朝代、劃時期之說，重言申明」¹⁴。此類「重言申明」在《隨園詩話》中隨處可見，並散見在其相關詩文作品中。為能更清楚釐清袁枚對於唐宋詩之爭的見解，本文是從《隨園詩話》、《文集》、《尺牘》等作品中勾稽袁枚如何重新檢視，甚至試圖調和唐宋詩之爭的說法，試圖對以上問題進行一番梳理與理解。

貳、隨園詩話與宗唐祖宋

唐宋詩論爭之興，往往環繞著唐宋詩之評價而起。因而要瞭解《隨園詩話》中的唐宋詩之爭議題，不能不對其中所論唐宋詩特色有先行的

⁹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754-755。

¹⁰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頁753-757。

¹¹ 王英志主編，《清代唐宋詩之爭流變史》，頁357-384。

¹² 王英志主編，《清代唐宋詩之爭流變史》，頁359。

¹³ 王英志主編，《清代唐宋詩之爭流變史》，頁360。

¹⁴ 錢鍾書，《談藝錄》，頁214。

理解。《隨園詩話》所論唐宋詩特色，著重在學習仿效的層面上，即後人如何學習唐詩、宋詩的表現，而非直接論及唐宋詩之優劣，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¹⁵。袁枚曾言：「余雅不喜苛論古人」¹⁶，此應為其修辭策略之一。儘管袁枚明確意識到不應以唐宋區分作品高下，但在評論上實仍不免「各有偏至」。觀察袁枚論宗唐、宗宋的議題，可見其在「詩不分唐宋」的前提下，如何透過後人學唐、宋詩的缺失，企圖鞏固自己的見解，進而調和前人對於唐、宋詩之「偏見」處。以下將從三方面進行探討：論學唐詩、論學宋詩與宋詩特色、辨唐宋詩之異同。以下分述之。

一、論學唐詩

《隨園詩話》所論學唐議題，較集中在批判明七子專主唐音、王士禛為一代正宗引領唐風與論學韓、宗杜等議題上。換言之，著重在「後人學唐」的議題上。在袁枚身處的乾嘉年間，唐詩的正宗是以王士禛《唐賢三昧集》的面目被認識的¹⁷，即以盛唐為宗，並以王孟一派為主，因而宗盛唐與宗杜甫是對立的。以下將分別從《隨園詩話》中論前七子、王士禛與學韓、宗杜的議題進行析論。

（一）從明七子論專學盛唐之弊

明七子，其主張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又被稱之為復古派詩學，與以公安、竟陵為代表的反復古派詩學，構成了明代以詩話為代表的兩

¹⁵ 袁枚詩論雖以性靈為宗，然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其理論多奠基在對稍前或同時代詩人的批判與辯論之上，宗唐祖宋的議題自不例外。詳參鄔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492。

¹⁶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264。

¹⁷ 詳參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76。

大主要詩學理念¹⁸。《隨園詩話》論明七子，主要是從其專主盛唐之處來進行批判。如以下兩則資料：

七子以盛唐自命，謂唐以後無詩，即宋儒習氣語。倘有好事者，學其附會，則宋、元、明三朝，亦何嘗無初、盛、中、晚之可分乎？節外生枝，頃刻一波又起。《莊子》曰：「辨生于末學。」此之謂也。¹⁹

明七子詩論專主盛唐，以唐以後無詩，將盛唐詩的地位提高至無以復加。袁枚對此甚為不滿，以為此乃「宋儒習氣語」，且「蔽於古而不知今，有拘墟皮傅之見」²⁰。袁枚反對將唐詩判分中、晚，主張以詩體流變的角度觀之，以七律的發展論明七子專學盛唐之弊：

七律始于盛唐，如國家締造之初，宮室粗備，故不過樹立架子，創建規模；而其中之洞房曲室，網戶罽毼，尚未齊備。至中、晚而始備，至宋、元而愈出愈奇。明七子不知此理，空想挾天子以臨諸侯；于是空架雖立，而諸妙皆捐。《淮南子》曰：「鸚鵡能言，而不能得其所言。」²¹

袁枚以詩體發展的角度觀之，認為七律起於盛唐，但其成熟要到「中、晚而始備，至宋、元而愈出愈奇」，因而七子專學盛唐反沒學到精華，只習得粗具規模的七律作品。由此可見，袁枚試圖是以詩體流變的角度取代朝代之別，藉此廓清唐宋詩，乃至於其後詩歌的分野，此為其融合的策略之一。因此，跳脫朝代風格、而以詩體發展的角度看待學唐的議題，可視為《隨園詩話》所主張較佳的學唐之道。

¹⁸ 蔡鎮楚，《中國詩話史》（湖南：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頁199。

¹⁹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190。

²⁰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75。

²¹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171。

(二) 從王士禎專主唐音論屏棄前見

王士禎為康熙年間著名詩人與詩論家，以神韻詩說風行一時。其論詩曾有三變²²，不廢宋元詩，亦編有《唐賢三昧集》。袁枚對於王士禎「不相菲薄不相師」²³，既不奉為宗師，亦不任意詆毀，大抵而言相當客觀而深入²⁴。《隨園詩話》論王士禎，主要是從其專主盛唐風格以立論。如以下兩則資料：

阮亭《池北偶談》笑元、白作詩，未窺盛唐門戶。此論甚謬……余按：元白在唐朝所以能獨豎一幟者，正為其不襲盛唐窠臼也。阮亭之意，必欲其描頭畫角若明七子，而後謂之窺盛唐乎？要知唐之李、杜、韓、白，俱非阮亭所喜。因其名太高，未便詆毀；于少陵亦時有微詞，況元、白乎？阮亭主修飾，不主性情。觀其到一處必有詩，詩中必用典，可以想見其喜怒哀樂之不真矣。或問：「宋荔裳有『絕代消魂王阮亭』之說，其果然否？」余應之曰：「阮亭先生非女郎，立言當使人敬，使人感且興，不必使人消魂也。然即以消魂論，阮亭之色，亦并非天仙化人，使人心驚者也。不過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屬清雅；又能加宮中之膏沐，熏海外之名香，傾動一時，原不為過。其修詞琢句，大概摭摭于大曆十子，宋、元名家，取彼碎金，成我風格，恰不沾沾于盛唐，蹈

²² 王士禎論詩三變，郭紹虞有云：「漁洋詩格與其論詩主張凡經三變，早年宗唐，中年主宋，晚年復歸於唐。」詳參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盤庚出版社，1978年），頁540。

²³ 清·袁枚，《小倉山房詩集》，見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冊1（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594。

²⁴ 袁枚論王士禎，錢鍾書認為「誠窺見至隱」詳見錢鍾書，《談藝錄》，頁212；另可參考王英志，〈不相菲薄不相師——袁枚對王士禎的評價〉，《文史知識》期1（1996年），頁80-96。

七子習氣，在本朝自當算一家數。奈歸愚、子遜奉若斗山，瓊沙、心餘棄若蜀狗：余以為皆過也。」²⁵

《隨園詩話》又云：

阮亭《詩話》，道晚唐人之「布穀啼春雨，杏花紅半村」，不如盛唐人之「興闌啼鳥緩，坐久落花多。」余以為真耳食之論。阮亭胸中，先有晚、盛之分，故不知兩詩之各有妙境。若以渾成而言，轉覺晚唐為勝。²⁶

在第一則資料可知，王士禎以元、白作詩「未窺盛唐門戶」。然而就袁枚看來，元、白不襲盛唐窠臼，正是其特出之處。王士禎「未窺盛唐門戶」之說，正表明他是以盛唐詩歌為標準來衡量元、白詩作，此種懷有前見的論詩方式，被袁枚視為是其論詩的一大局限，未能客觀見出詩的價值。在第二則資料中，袁枚便直接批判王士禎心中先存有盛、晚唐之價值評斷，因而不能見出盛、晚唐詩各有風格之處，是其失也。由《隨園詩話》論王士禎可知，袁枚是以初、盛、中、晚各有風格，不應強分高下，「論詩區別唐、宋，判分中、晚，余雅不喜」²⁷。而「不襲窠臼」一說，則顯示了袁枚重視「新變」的詩學觀。事實上，袁枚認為王士禎之所以能成為「一代名家」，正在他能「招撫于大曆十子，宋、元名家」，「恰不沾沾于盛唐，蹈七子習氣」，因而能「在本朝自當算一家數」。總的來說，袁枚《隨園詩話》是藉由批評王士禎專主盛唐之說，建立其強調新變、不懷前見與重視個別風格的詩學主張。

²⁵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77。

²⁶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216-217。

²⁷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234。

(三) 從「博覽為工」、「反因襲」論學韓、宗杜之失

袁枚所處的乾嘉年間，學韓宗杜的情形亦相當普遍，以翁方綱為首的肌理派詩人是為代表。翁方綱本身為考據學家，詩論主張「肌理」，即詩中要有義理，力主「詩必能切己切時切事，一一具有實地，而後漸能幾於化也」²⁸。簡言之，即是主張「求實」的詩風。翁方綱重視宋詩，正在其「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事日密」²⁹上。在此標準下，翁方綱標舉杜甫、韓愈，是以杜詩作為「根極於六經」³⁰之作，而論韓愈則以其「不涉議論而理字之渾然天成」³¹而論，足見肌理說的理論取向。袁枚一向反對以考據入詩³²，主張詩主性靈而非義理，因而其詩話中對肌理說頗多批判。袁枚認為學韓宗杜的一個危機在「附會大家門面，而不能判別真偽，采擷精華」³³：

文尊韓，詩尊杜：猶登山者必上泰山，泛水者必朝東海也。然使空抱東海、泰山，而此外不知有天台、武夷之奇，瀟湘、鏡湖之勝；則亦泰山上之一樵夫，海船上之舵工而已矣。學者當以博覽為工。³⁴

又如：

²⁸ 鄔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頁 535。

²⁹ 鄔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頁 536。

³⁰ 鄔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頁 538。

³¹ 鄔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頁 539。

³² 《隨園詩話》中反對考據入詩的記載頗多，諸如「人有滿腔書卷，無處張皇，當為考據之學，自成一家……何必借詩為賣弄？」（頁 141）又如「考據家不可與論詩」（頁 431）。

³³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450。

³⁴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257。

抱韓杜以凌人，而粗腿笨手者，謂之權門托足。仿王、孟以衿高，而半吞半吐者，謂之貧賤驕人。開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韻者，謂之木偶演戲。故意走宋人冷徑者，謂之乞兒搬家。好疊韻、次韻，刺刺不休者，謂之村婆絮談。一字一句，自注來歷者，謂之骨董開店。³⁵

韓愈、杜甫是唐代大家，自不待言，但倘若「抱韓、杜以凌人」，則容易不見百官之美，宗廟之富。袁枚認為學詩當以「博覽為工」，而非專主名家。事實上，「附會大家門面」確實容易造成問題，如翁方綱強調杜詩、韓詩中崇尚經義、理語的成分，但這些並非全是杜詩、韓詩的精華所在³⁶，因而袁枚此說確有切中肯綮之處³⁷。此外，袁枚更指出專學大家之弊病，在於無大家之精神，學之反而「化虎不成，反類狗也」：

凡事不能無弊，學詩亦然。學漢、魏《文選》者，其弊常流于假；學李、杜、韓、蘇者，其弊長失于粗；學王、孟、韋、柳者，其弊長流于弱；學元、白、放翁者，其弊長失于淺；學溫、李、冬郎者，其弊常失于纖。人能吸諸家之精華，而吐其糟粕，則諸弊盡捐。大概杜、韓以學力勝，學之，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太白、東坡以天分勝，學之，畫虎不成，反類狗也。佛云：「學我者死。」無佛之聰明而學佛，自然死矣。³⁸

袁枚舉出專學大家的弊病，漢魏、唐宋名家皆在其中，可見其不分唐宋，而主張「吸諸家之精華，而吐其糟粕，則諸弊盡捐」。在學韓宗杜的議題

³⁵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143。

³⁶ 鄔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頁538-539。

³⁷ 有論者以袁枚詩論非嚴肅之作，只是遊戲筆墨，不可認真論之。就其行文觀之，或許確有此意，然其詩論是否因此毫無價值？或許暫且客觀論之，再做評斷。

³⁸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99。

上，袁枚則認為杜甫、韓愈以學力勝，無相應學力而強學之，則「刻鵠不成，猶類鶩也」。

那麼，究竟該如何「學杜」呢？在詩歌創作上，袁枚認為沒有不學而成的詩人³⁹，只是要學前人，必須習其精華，而非枝葉。在學杜的議題上，袁枚便重在杜甫的「芬芳悱惻之懷」：

人必先有芬芳悱惻之懷，而後有沉鬱頓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飯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兒女間，何在不一往情深耶？觀其冒不韙以救房公，感一宿而頌孫宰，要鄭虔于泉路，招李白于匡山；此種風義，「可以興，可以觀」矣。後人無杜之性情，學杜之風格，抑末也！⁴⁰

袁枚認為應習杜甫之「性情」，如此才是真學杜，切勿「無病而呻」，或「專學其木」⁴¹。此外，學杜更要能「別數一旗」，自出機杼，而非一味「描詩」。《隨園詩話》對學杜有如是記載：

高青丘笑古人作詩，今人描詩。描詩者，像生花之類，所謂優孟衣冠，詩中之鄉愿也。譬如學杜而竟如杜，學韓而竟如韓：人何不觀真杜、真韓之詩，而肯觀偽韓、偽杜之詩乎？孔子學周公，不如王莽之似也；孟子學孔子，不如王通之似也。唐義山、香山、牧之、昌黎、同學杜者；今其詩集，都是別樹一旗。杜所伏膺者，庾、鮑兩家；而集中亦絕不相似。蕭子顯云：「若無新變，不能代

³⁹ 清·袁枚，《隨園詩話》云：「後之人未有不學古人而能為詩者也。然而善學者，得魚忘筌；不善學者，刻舟求劍。」（頁 48）

⁴⁰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482。

⁴¹ 清·袁枚，《隨園詩話》：「明鄭少谷詩學少陵，友林貞恒譏之曰：『時非天寶，官非拾遺，徒托于悲哀激越之音，可謂無病而呻矣！』學杜者不可不知。」（頁 189）另有一則記載：「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余謂：人可以木，詩不可以木也。人學杜詩，不學其剛毅，而專學其木；則成不可雕之朽木矣。」（頁 510）

雄。」陸放翁曰：「文章切忌參死句。」黃山谷曰：「文章切忌隨人後。」皆金針度人語。《漁隱叢話》笑歐公：「如三館畫筆，專替死人傳神」，嫌其描也。五亭山人《嘲鸚鵡》云：「齒牙餘慧雖偷拾，那識雷同轉可羞。」又曰：「爭似流鶯當百轉，天真還是一家言。」⁴²

袁枚提出一有力的詰問：若後人學杜宗韓而不能自出新意，則「人何不觀真杜、真韓之詩，而肯觀偽韓、偽杜之詩乎？」袁枚認為，唐代李商隱、白居易、杜牧、韓愈皆有學杜，但都能自成風格「別敷一旗」，因而得以各自成家，各領風潮。杜甫服膺庾信、鮑照，但「集中絕不相似」。可見學杜要能自出新意最為重要，而非亦步亦驅。袁枚引用蕭子顯「若無新變，不能代雄」之說，與宋人如陸游、黃庭堅重視新變之說⁴³，以二者為「金針度人語」，足見袁枚論詩強調新變的取向。由此可見，袁枚主張博覽群家，反對因襲，學韓宗杜若流於描詩，則不如不學，此為其論學韓宗杜之大要也。由此觀之，袁枚乃是經由批評當代學韓宗杜、專學一家的缺失，進而提倡「博覽為工」、「反對因襲」的詩學主張。

二、論學宋詩與宋詩特色

《隨園詩話》中論學宋詩所呈顯的宋詩特色，可分為三大方面：一、批評後人學宋之弊，以浙派為代表；二、專論宋詩名家特色，如蘇軾、黃庭堅、梅堯臣、楊萬里、王安石；三、從「新變」的角度論宋詩地位。資料可謂豐富。然與論學唐詩不同，袁枚並未明確指出該如何學習宋詩。

⁴²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227-228。

⁴³ 宋人重視新變，與宋詩的特色之形成密切相關。關於宋詩特色與新變代雄的關聯，詳參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臺北：洪葉文化，1995 年）一書。

(一) 論浙派專走宋人冷徑之弊

浙派為清代浙江一帶文人所形成的詩歌流派，又可分為浙派與秀水派⁴⁴。浙派主張以學問入詩，以詩為學，因而深受宋詩影響。袁枚出身浙江，對浙派詩人有不少往來，關注甚多，又被學者稱為「浙派得失的評判者」⁴⁵。儘管袁枚不喜浙派，但對浙派的厲鶚近體實是相當推崇⁴⁶。遇沈德潛詆謫浙派，亦為文相駁⁴⁷，對浙派得失實有一番深入解讀。《隨園詩話》所論浙派，主要是針對其代表人物厲鶚而發。袁枚明言不喜浙派，在於其好用替代字、僻典，「專趨宋人生癖一路」⁴⁸。《隨園詩話》有云：

吾鄉詩有浙派，好用替代字，蓋始于宋人，而成于厲樊榭。……樊榭在揚州馬秋玉家，所見說部書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有類《庶物異名疏》、《清異錄》二種。董竹枝云：「偷將冷字騙商人。」責之是也。⁴⁹

浙派之所以好用說部僻典，主要是藉此塑造一種獨特的美感。此舉始於宋人⁵⁰，成於浙派。厲鶚之好用僻典，因曾館於揚州商人馬曰琯家中，藉

⁴⁴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頁 605。

⁴⁵ 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頁 46。

⁴⁶ 袁枚儘管不喜浙派，亦對厲鶚詩好用代字僻典不以為然，但卻以厲鶚近體為浙派第一。《隨園詩話》：「厲公七古氣弱，非其所長；然近體清妙，至今為浙派者，誰能及之？」詳見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796。

⁴⁷ 即袁枚〈答沈大宗伯論詩書〉，文中提及：「先生謫浙詩，謂沿宋習、敗唐風者，自樊榭為厲階……然其近體清妙，于近今少偶。先生詩論粹然，尚復何說？然鄙意有未盡同者，敢質之左右。」詳見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頁 283。

⁴⁸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648。

⁴⁹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309。

⁵⁰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頁 617-620。

由小玲瓏山館的豐富藏書，因而得以出入典故⁵¹。袁枚卻視之為「皮傳殘宋」之行為。袁枚〈《萬柘坡詩集》跋〉云：

近體索索，殊少真氣；說者謂為宋人所累。余按宋名家絕無此種。考厥濫觴，始于吾鄉輟材諷說之徒，專屏彩色聲音，鈎考隱僻，以震耀流俗，號為浙派。一時賢者，亦附下風。不知明七子貌襲盛唐，而若輩乃皮傳殘宋，棄魚菽而啖豨苓，尤無謂也。⁵²

萬柘坡近體學宋人，有人稱其詩「疏少真氣」⁵³，以為是受學宋詩影響。袁枚不以為然，以為宋名家並無此病，此病始於浙派詩人。李重華在《貞一齋詩說》中亦有近似主張：

詩家奧衍一派，開自昌黎；然昌黎全本經學，次則屈、宋、揚、馬亦雅意取裁，故得字字典雅。後此陸魯望頗造其境。今或滿眼陸離，全然客氣；問所從，則曰我韓體也。且謂四庫書俱尋常聞見，於是專取說部，摭拾新奇，以誇繁富。不知說部之學，眉山時復用之者，不過借作波瀾，初非靠為本領。今所尚止在於斯，乃正韓、蘇大家吐棄不屑者，安得以奧衍目之？⁵⁴

從袁枚與李重華之說可知，兩人皆將浙派好用僻典、代字所造成的弊病歸咎於詩人自身的審美考量，而非是受宋名家詩之影響。換言之，袁枚認為此「冷境」是浙派詩人自己走出來的，與宋詩無涉，可說還給宋詩

⁵¹ 詳參方盛良，〈清代士商互動之文化原生態個案考論——厲鶚與「小玲瓏山館」〉，《文學評論》期4（2007年），頁114-120。

⁵² 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頁201。

⁵³ 萬光泰，字循初，一字柘坡，浙江秀水人，乾隆元年丙辰舉博學鴻詞，著有《柘坡居士集》。引自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乾隆朝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4992。

⁵⁴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收錄於丁福保編，《清詩話》（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頁932。

一個公道。事實上，宋人使用僻典正是宋詩求新尚變之處⁵⁵，意在展現陌生化的美感。先前袁枚曾引宋人陸游「文章切忌參死句」、黃庭堅「文章切忌隨人後」之說，以此與蕭子顯「若無新變，不能代雄」相互輝映，足見袁枚對宋詩求新變之處有所瞭解，但卻以浙派學之太過，「宋名家絕無此種」。如此可見，儘管袁枚肯定宋代詩人追求新變的主張，但卻不甚欣賞宋詩之所以力求新變之處，此為袁枚論宋詩的局限所在。

（二）專論宋詩名家特色：論蘇軾、黃庭堅、梅堯臣等宋詩名家

《隨園詩話》論宋名家詩特色，是以黃庭堅、蘇軾、王安石、楊萬里與梅堯臣為大宗，惟標舉楊萬里外，餘皆從負面入手為多，可見袁枚對宋名家詩之評價。以下個別進行說明。

1. 從「味少」、「粗硬」論黃庭堅——兼與梅堯臣比較

《隨園詩話》論黃庭堅，共有資料四則⁵⁶。袁枚直言不喜黃庭堅詩，與其要求平易、精深的詩學理念密切相關，因而對黃庭堅詩之「炫奇」、「瘦硬」頗多不滿：

余不喜黃山谷詩，而古人所見有相同者。魏泰譏山谷：「得機羽而失鷓鴣，專拾取古人所吐棄不屑用之字，而矜矜然自炫其奇，抑末也。」王弇州曰：「以山谷詩為瘦硬，有類驢夫腳跟，惡僧藜杖。」東坡云：「讀山谷詩，如食蝟蟬，恐發風動氣。」郭功甫云：「山谷作詩，必費如許氣力，為是甚底？」林艾軒云：「蘇詩如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去。黃詩如女子見人，先有許多妝裹作相。此蘇、

⁵⁵ 例如黃庭堅作詩為求出新，許多詩篇「顛倒平仄、破棄聲律、搜求僻典、揣摩奇意，極盡標新立異之能事」，意在追求一種「不經人道，古所未有」的獨特美感。詳參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頁 83。

⁵⁶ 詳見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11、72、262、608-609。

黃兩公之優劣也。」余嘗比山谷詩：如果中之百合，蔬中之刀豆也，畢竟味少。⁵⁷

黃庭堅詩被視為江西詩派祖師，其特色在「清新奇峭，頗造前人未嘗道處，自為一家，此其妙也」⁵⁸。袁枚表明不喜山谷詩，在於「味少」之故。山谷詩因求新尚奇，因而在詩味上略顯不足，此為切實之論。袁枚更以黃庭堅與梅堯臣詩進行一番對照，以山谷詩粗硬、欠平淡，而梅堯臣詩平淺，欠精深：

晁以道問邵博：「梅二詩，何如黃九？」邵曰：「魯直詩到人愛處，聖俞詩到人不愛處。」其意似尊梅而抑黃。余道：兩人詩，俱無可愛。一粗硬，一平淺。⁵⁹

又云：

《漫齋語錄》曰：「詩用意要精深，下語要平淡。」余愛其言，每作一詩，往往改至三五日，或過時而又改。何也？求其精深，是一半工夫；求其平淡，又是一半工夫。非精深不能超超獨先，非平淡不能人人領解。朱子曰：「梅聖俞詩，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何也？欠精深故也。郭功甫曰：「黃山谷詩，費許多氣力，為是甚底？」何也？欠平淡故也。有汪孝廉以詩投余。余不解其佳。汪曰：「某詩須傳五百年後，方有人知。」余笑曰：「人人不解，五日難傳；何由傳到五百年耶？」⁶⁰

從這兩則可知，袁枚是以「用意精深」、「下筆平淡」的標準看待這兩位宋代詩人，因而黃庭堅詩顯得過於粗硬，稍欠平淡，梅堯臣詩則又過於

⁵⁷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11-12。

⁵⁸ 陳巖尚《庚溪詩話》之語，轉引自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頁 70。

⁵⁹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608-609。

⁶⁰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262。

平淺，稍欠精深。袁枚所提「精深」一意，認為「非精深不能超超獨先」。事實上，宋人「超超獨先」之處，正在「不經人道，古所未有」、「困難見巧，精益求精」⁶¹。反映在詩歌創作上，則形成一種「意新語工」的詩風傾向，正如梅堯臣謂：「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⁶²儘管袁枚肯定黃庭堅「文章切忌隨人後」，但對其詩作之新創處則未能欣賞與理解。此種情形，正反映了袁枚雖主張詩不分唐宋，但對於宋詩本身的藝術價值仍不懂得欣賞，且針對宋詩的審美系統尚未建立，因而只能存著「唐樣」來看待宋詩，因而才有「兩人詩，俱無可愛」的見解，此為《隨園詩話》論黃庭堅、梅堯臣詩歌的局限。

2. 論東坡詩「能剛不能柔」之病

「詩必讀蘇」的風氣在清代中葉頗為盛行。《隨園詩話》：「間有習字作詩者，詩必讀蘇，字必學米，倏然自足」⁶³。然袁枚謂此風氣「有不可解者」，甚至稱東坡詩為「惡詩」，以為「隨聲者多，審音者少（應邵語）」⁶⁴，足見袁枚對東坡詩之評價。何以袁枚道出此語？憑藉何種標準？《隨園詩話》論東坡詩，著重在其近體短少「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東坡近體詩，少蘊釀烹煉之功，故言盡而意亦止，絕無弦外之音、味外之味。阮亭以為非其所長，後人不可為法，此言是也。然毛西河詆之太過。或引「春江水暖鴨先知」，以為是坡詩近體之佳者。西河云：「春江水暖，定該鴨知，鵝不知耶？」此言則太鶻突矣。若持此論詩，則《三百篇》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斑鳩、鳴鳩

⁶¹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頁 79。

⁶² 歐陽修，《六一詩話》，見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冊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 267。

⁶³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37。

⁶⁴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12。

皆可在也，何必「睢鳩」耶？止丘隅者，黑鳥、白鳥皆可止也，何必「黃鳥」耶？⁶⁵

袁枚以東坡近體詩少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此亦為後人對東坡詩的評價。袁枚認為關鍵在於東坡詩有才而無情，能剛而不能柔：

東坡詩，有才而無情，多趣而少韻：由于天分高，學力淺也。有起而無結，多剛而少柔：驗其知遇早晚景窮也。⁶⁶

又如：

詩人筆太豪健，往往短于言情；好徵典者，病亦相同。即如悼亡詩，必纏綿婉轉，方稱合作。東坡之哭朝雲，味同嚼蠟：筆能剛而不能柔故也。⁶⁷

由此可見，袁枚是以主情、尚柔的詩歌標準看東坡詩，換言之，亦是屬於唐詩的標準。就風格而論，唐詩主情尚意，故較柔；宋詩主理尚氣，故為剛⁶⁸。袁枚曾以剛柔定李、杜、韓、蘇四大家，「惟李杜剛柔參半，韓蘇純剛，白香山則純乎柔矣」，足見袁枚視「剛柔並濟」為詩歌創作的最高理想，以唐代詩人李杜為代表，而東坡、山谷詩則「終有行行之氣」，⁶⁹視為「純剛」，足見袁枚論詩實是近於唐音。

3. 論王安石詩

袁枚論宋名家詩中，攻擊最力的當屬王安石。袁枚論王安石詩，實已超越客觀論詩，而更像是主觀論人：

⁶⁵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68。

⁶⁶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235。

⁶⁷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468-469。

⁶⁸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頁 4。

⁶⁹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608。

王荊公作文，落筆便古；王荊公論詩，開口便錯。何也？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執，故琢句選詞，迴不猶人。詩貴溫柔，而公性情刻酷，故鑿險絕幽，自墮魔障。其平生最得意句云：「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余以為首句是乞兒向陽，次句是村童逃學。然荊公恰有佳句，如：「近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燈。」可謂生平傑作矣。⁷⁰

又如：

王荊公詩無一句自在，故其為人拗強乖張。余謂荊公古文，直逼昌黎，宋人不敢望其肩項；若論詩，則終身在門外……大抵宋人好矜博雅，又好穿鑿，故此種剜肉生瘡之說，不一而足。⁷¹

袁枚以王安石詩「琢句選詞，迴不猶人」、「鑿險絕幽，自墮魔障」，又稱其詩「無一句自在」，究其原因竟是「天性拗執」之故，可見袁枚對王安石有其偏見，有失公允。比起批評山谷、東坡詩背後是以唐詩的藝術標準加以檢視，袁枚對王安石詩的批評背後則是出於對王安石這位歷史人物性格的偏見了。齊治平先生謂《隨園詩話》曰：「於聖俞、永叔、荊公、東坡、山谷諸家，皆肆口譏彈，了無忌憚」，又稱袁枚「實喜唐而惡宋」。⁷²綜合觀之，可見袁枚論詩確實有著明顯的宗唐傾向，而對荊公詩的評論則有「肆口譏彈，了無忌憚」之嫌。

4. 標舉楊誠齋的意義

在宋名家詩中，袁枚惟標舉楊萬里一人。《隨園詩話》云：「余不喜黃山谷，而喜楊誠齋。」⁷³黃庭堅被奉為江西詩派的始祖，楊萬里亦初學

⁷⁰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161。

⁷¹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20。

⁷² 齊治平，《唐宋詩之爭概述》，頁117-118。

⁷³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272。

江西，後雖自江西出，但畢竟曾是江西中人。何以袁枚不喜黃庭堅，卻如此看重楊萬里？《隨園詩話》論楊萬里道：

汪大紳道余詩似楊誠齋。范瘦生大不服，來告余。余驚曰：「誠齋一代作手，談何容易！後人嫌太雕刻，往往輕之。不知其天才清妙，絕類太白；瑕瑜不掩，正是此公真處。至其文章氣節，本傳具存；使我擬之，方且有愧。」⁷⁴

楊萬里，又被稱為南宋中興四大詩人，其詩又被稱為「誠齋體」。「誠齋體」的特色在於情趣盎然、以萬物為友、擅寫生，發人所未發、想像豐富與通俗淺易⁷⁵，其中頗有與袁枚論詩相合之處，其中「發人所未發」、「崇尚獨創」⁷⁶尤其引起袁枚的共鳴。《隨園詩話》有如是記載：

詩空談格調，不主性情，楊誠齋道是「鈍根人所為」。近又有每動筆專摹古樣者。不知鑄錢有范，而人之求之者，買錢不買范也。遺腹子祭墓，備極三牲五鼎，而終不知乃翁之聲音笑貌在何所，豈不可笑！⁷⁷

楊萬里早年學江西，中年不滿江西末流因襲仿效之弊，因而轉而批評江西以門戶自拘，主張從現實出發，以真情實感作為根基。此點正與袁枚詩論中專主性靈相互呼應。此外，楊萬里學詩「自江西入，從晚唐出」，可說「入乎其內，出乎其外」⁷⁸，此種唐宋兼采、轉益多師的學習取向，正與袁枚的調和唐宋的意圖暗合，因而袁枚標舉楊萬里的原因正在於斯。

⁷⁴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263。

⁷⁵ 關於楊萬里詩歌與詩論之要點，詳參周啟成，《楊萬里和誠齋體》（臺北：萬卷樓圖書，1993年）。

⁷⁶ 周啟成，《楊萬里和誠齋體》，頁114-116。

⁷⁷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786。

⁷⁸ 關於宋詩之「出入之思」，詳參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頁89。

從袁枚對宋名家詩的見解來看，儘管袁枚主張「詩不分唐宋」，強調新創，不懷前見，但他對宋代詩人的評價卻多從唐詩的審美標準來衡量，因而多趨於負面。唯一標舉的宋代詩人楊誠齋，則是因其能兼采唐宋而多所推崇。由此可見袁枚論詩實有著宗唐的取向。然而，袁枚對宋詩的整體評價為何？詳參後論。

（三）從「新變」的角度論宋詩地位

《隨園詩話》對於宋詩的基本態度，從對浙派詩的角度看，袁枚以浙派趨宋人冷境，此弊是由浙派而起，大致還給宋詩公道；在對宋名家詩的態度上，主要仍是從唐詩的標準看待宋詩，儘管明白宋代詩人講求新變的意圖，但對其新創處仍未能欣賞與理解，甚至多所譏評，此為袁枚自身的局限。袁枚於宋詩名家中惟標舉楊萬里，因楊萬里「從江西入，從晚唐出」，與袁枚調和唐宋詩的意圖暗合，且詩重獨創，反對模擬，因而在宋代詩人中特別推舉楊萬里。然而，袁枚對於宋詩整體的評價究竟為何？在宋詩的地位上，袁枚基本上是從新變的角度加以肯定：

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非有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使不變，則不足以為唐，不足以為宋也。子孫之貌，莫不本於祖父；然變而美者有之，變而醜者有之。若必禁其不變，則雖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許唐人之變漢、魏，而獨不許宋人之變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自變其詩，與宋人無與乎？初、盛一變，中、晚再變，至皮、陸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風會所趨，聰明所極；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嘗謂變堯、舜者，湯、武也；然學堯、舜者，莫善於湯、武，莫不善於燕噲。變唐詩者，宋、元也；然學唐詩者莫善於宋、元，莫不善於明七子。

何也？當變而變，其相傳者心也；當變而不變，其拘守者迹也。
鸚鵡能言，而不能得其所言，夫非以迹乎哉？⁷⁹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之緣由，起於沈德潛「謫浙詩，謂沿宋習、敗唐風者，自樊榭為厲階」之說。袁枚為厲鶚辯護，並引出唐宋詩之議題。袁枚肯定宋之學唐變唐，乃是「風會所趨，聰明所極」，且是「當變而變」，在此基礎上肯定宋詩求新尚變的藝術特質。關於袁枚對宋詩「變唐」之說，亦可從其藉杭世駿之口道出對馮班右西崑黜江西的看法中得到另一見證：

董浦先生曰：「馮鈍吟右西崑而黜西江，固矣！夫西崑沿于晚唐，西江盛于南宋；今將禁晉、魏之不為齊、梁，禁齊、梁之不為開元、大曆，此必不得之數。風會流傳，人聲因之，合三千年之人，為一朝之詩，有是理乎？二馮可謂能持詩之正，未可謂遂盡其變者也。」⁸⁰

馮班為清初詩論家，其詩論主崇尚晚唐而黜江西。袁枚基本上以馮班此說「持詩之正」，足見袁枚傾向唐詩，不喜江西詩風，但也認為馮班專主晚唐而非江西之說是未能「盡其變」。若從「變」的角度詮釋，則晚唐之變為宋詩，江西詩派之盛於南宋，正是時代風氣所趨而不得不變，若要以一朝之詩籠罩數代風格，則絕無此理。論唐宋詩上亦可作此解。換言之，儘管袁枚不欣賞宋詩的藝術風格，但也不因此否定宋詩的存在價值，反而從「變」的角度予以肯定，「當變而變，其相傳者心也」。張健《清代詩學研究》一書中曾指出，肯定宋詩的審美系統有兩大系統，一為承認尊唐者建立的審美價值，強調宋詩對於唐詩傳統的承繼，清初宗宋派大抵屬於此類；其二則是承認宋詩不符合唐詩傳統，承認宋詩是一異質

⁷⁹ 清·袁枚，〈答沈大宗伯論詩書〉，《小倉山房文集》，頁 284。

⁸⁰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260-261

的傳統，但又建立一個新的審美價值來肯定宋詩⁸¹。就《隨園詩話》而言，無疑是從變唐的角度來肯定宋詩的地位。

然宋詩如何變唐？宋詩求新尚變之處又在何處？關於宋詩如何自成一派，進而得以新變代雄，近人已有豐碩研究⁸²。儘管袁枚領悟宋詩學唐以變唐，但具體如何「變」則少見說明。張高評論宋詩之傳承與開拓，其法約有四端：一為「不經人道，古所未有」；二為「困難見巧，精益求精」；三為「破體為文，即事寫情」；四為「出位之思，補偏救敝」。⁸³袁枚指出宋詩為「詩中之文」：

劉曾燈下誦《文選》，倦而就寢，夢一古衣冠人告之曰：「魏、晉之文，文中之詩也；宋、元之詩，詩中之文也。」既醒，述其言于余。余曰：「此余夙論如此。」⁸⁴

袁枚以魏晉之文與宋元之詩進行對比，以前者為「文中之詩」，後者為「詩中之文」。袁枚以宋詩為「詩中之文」之說，正是宋詩得以自成一派的重要關鍵，即在「破體為文」⁸⁵。張高評認為：

所謂文中有詩、詩中有文、文人之詩、詩無定體云云，可見宋人破體為詩，是繼往開來的創作，是絕處逢生的妙法，既兼顧唐詩之典範制約，又能作突破轉化，與開發拓展，因此形成創意、靈活、獨特而不失傳統之宋詩。在盛極難繼之唐詩之後，成為救衰、

⁸¹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頁 378-379。

⁸² 關於宋詩之自成一派，新變代雄之研究，可參張高評對宋詩的系列研究，如《宋詩之新變與代雄》、《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臺南：成大出版組，2000年）、《自成一派與宋詩宗風》（臺北：萬卷樓圖書，2004年）等著作。

⁸³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頁 79。

⁸⁴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43。

⁸⁵ 關於宋詩之「破體為文」之理論與實踐，詳參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頁 89-93。

啟盛、繁榮、通久之特殊體格。與唐詩「相異而真」，可以方駕而無愧。⁸⁶

「以文為詩」之說為宋人所提出，袁枚再拈出此說，證以今人之研究，可見袁枚論宋詩確實獨具隻眼，宋詩與唐詩之殊異正在於斯。儘管袁枚並未意識到此正是宋詩與唐調之別。事實上，袁枚對於唐宋詩異同自有一番見解，待後文解析之。

三、辨唐宋詩之異同

袁枚認為唐宋詩之異同究在何處？就今日來看是否合理？《隨園詩話》辨唐宋詩之異同，主要有以下三項：一、宋詩好用僻韻、唐詩則否；二、唐宋詩有雅俗之別；三、唐宋詩有性情厚薄之分。從袁枚辨唐宋詩之異同，最能直接見出袁枚對唐宋詩之評價。

（一）宋詩好用僻韻，唐詩則否

袁枚認為唐宋詩之別在於用韻。宋詩好用僻韻，唐詩則否，此正是唐音宋調之別。《隨園詩話》有載：

欲作佳詩，先選好韻。凡其音涉啞滯者、晦僻者，便宜棄捨。「葩」即「花」也，而「葩」字不亮；「芳」即「香」也，而「芳」字不響：以此類推，不一而足。宋、唐之分，亦從此起。李、杜大家，不用僻韻；非不能用，乃不屑用也。昌黎鬥險，掇《唐韻》而拉雜砌之，不過一時遊戲；如僧家作孟蘭會，偶一布施窮鬼耳。然亦止于古體、聯句為之。今人效尤務博，竟有用之于近體者：是猶奏雅樂而雜侏儒，坐華堂而宴乞丐也，不已僂乎！⁸⁷

⁸⁶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頁 93。

⁸⁷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179。

其文〈答祝芷塘太史〉中亦有相似之說：

欲作詩，先選好韻，唐人用韻，非響者不押，非穩者不押，非清脆者不押，非在眼前者不押，所以易於傳誦，可播管弦。獨昌黎以險韻矜奇，東坡以疊韻見巧，此不過一時興到，以儒為戲，乘人而鬥其捷。如僧家作孟蘭會，布施餓鬼、夜叉，非正法眼藏，上乘神通也。⁸⁸

從第一則資料可知，袁枚皆以宋詩用韻好用僻韻，唐詩則否，並認為「宋、唐之分，亦從此起」。袁枚舉出李白、杜甫詩為例，以其不用僻韻是「非不能用，乃不屑用」。在〈答祝芷塘太史〉文中，袁枚更直指唐人用韻「非響者不押，非穩者不押，非清脆者不押，非在眼前者不押，所以易於傳誦，可播管弦」。反觀宋詩，袁枚認為宋詩之弊亦在於此。其〈答蘭垞第二書〉有云：

來書極言唐詩之弊，故以學宋為解……唐詩之弊，子既知之矣；宋詩之弊，而子亦知之乎？不依永，故律亡；不潤色，故彩晦。又往往疊韻如蝦蟆繁聲，無理取鬧。或使事太僻，如生客闖入，舉座寡歡。其他禪障理障，瘦詞替語，皆日遠夫性情。病此者，近今吾浙為尤。雖瑜瑕不掩，有可傳者存；然西施之顰，伯牛之癩，固不如其勿顰勿癩也。況非西施與伯牛乎！⁸⁹

在〈答蘭垞第二書〉中，袁枚明確指出「宋詩之弊」，包括使用僻韻、生典等，「病此者，近今吾浙為尤」。儘管「瑜瑕不掩」，但畢竟「遠夫性情」，而非詩之正軌。袁枚亦舉唐之韓愈與宋之蘇軾為例，唐人中惟有韓愈以險韻矜奇，但屬「一時遊戲：如僧家作孟蘭會，偶一布施窮鬼耳」；而東

⁸⁸ 清·袁枚，《小倉山房尺牘》，見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冊5（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203。

⁸⁹ 清·袁枚，〈答蘭垞第二書〉，《小倉山房文集》，頁287-288。

坡以疊韻見巧，則是「一時興到，以儒為戲，乘人而鬥其捷也」。袁枚視唐人之韓愈、宋人之蘇軾用險韻為「一時遊戲」、「一時興到」，因而批判今人將此法作為創作之正體，即「今人效尤務博，竟有用之于近體者」。總的來說，在辨唐宋詩之異同時，袁枚舉唐之韓愈與宋之蘇軾為例說明，此中或有兼采唐宋的調和之意；論及宋詩之弊時，儘管羅列數項，但以「病此者，近今吾浙為尤」作結，可見袁枚意不在高舉批判宋詩的旗幟，而是希望今人能夠在前人創作上更進一層，回歸他所認為的詩之正體。

（二）雅俗之別

袁枚認為唐宋詩之不同，還在於雅俗之別。主要是在用字上，唐詩用字較雅，宋詩以白話入詩，此為唐宋詩之異所在。《隨園詩話》有云：

余嘗鑄香爐，合金、銀、銅三品而火化焉。爐成後，金與銀化，銀與銅化，兩物可合為一；惟金與銅，則各自凝結：如君子小人不相入也。因之，有悟于詩文之理。八家之文、三唐之詩，金、銀也。不攙和銅、錫，所以品貴。宋、元以後之詩文，則金、銀、銅、錫，無所不攙，字面欠雅馴，遂為耳食者所擯，并其本質之金、銀而薄之，可惜也！……劉禹錫不敢題「糕」字，此劉之所以為唐詩也。東坡笑劉不題「糕」字為不豪，此蘇之所以為宋詩也。人不能在此處分唐、宋，而徒在渾含、刻露處分唐、宋；則不知《三百篇》中，渾含固多，刻露者亦復不少。此作偽唐詩者之所以陷入平庸也。⁹⁰

詩歌語言的「以俗為雅」，的確是從宋代才開始興盛⁹¹。宋人創作多倡導「化俗為雅」，因而詩歌語言趨向日常生活與通俗化，成為宋詩異於唐詩

⁹⁰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219-220。

⁹¹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頁317。

的主要特徵⁹²。袁枚認為此正是唐宋詩之大別，「人不能在此處分唐、宋，而徒在渾含、刻露處分唐、宋」，足見袁枚認為專從「渾含」、「刻露」區分唐宋太過簡略。袁枚以「鑄香爐」為例，唐詩猶如金、銀；宋元後詩則是金、銀、銅、錫無所不參。從袁枚所舉劉禹錫與蘇軾之例觀之，應是指唐宋詩「語言之轉化」⁹³。唐詩語言較為雅化，以書面語為主，口頭語只用於通俗文學，而不能入詩；宋元詩始將以往不入詩的俗字俚語，及口頭語加入詩中，因而造就宋詩獨特的風貌，袁枚認為此正是唐宋詩不同之大要，對照今日之研究，確實是切中肯綮。

袁枚對於宋詩之走向通俗、白話的特點之評價為何？袁枚對於後人對宋元詩之近俗的負面評價不以為然，「并其本質之金、銀而薄之，可惜也！」事實上，袁枚之標舉楊萬里，正展現他對白話入詩的肯定，因楊萬里正是宋代以白話、俗語入詩的代表詩人⁹⁴，「以俗為雅」亦是其詩論主張。袁枚對宋詩以白話、俗語入詩這點是肯定的，且以「雅俗之別」作為區分唐、宋詩的一個重要關鍵。然而，袁枚對所謂宋詩「本質之金」處則未多加說明。袁枚對唐宋詩之異在「雅俗之別」，另有一例可以說明，是比較唐、宋人的牡丹詩。《隨園詩話》有載：

牡丹詩最難出色。唐人「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之句，不如「嫩畏人看損，嬌疑日炙消」之寫神也。其他如：「應為價高人不問，恰緣香甚蝶難親。」別有寄托。「買栽池館疑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別有感慨。宋人云：「要看一尺春風面。」俗矣！⁹⁵

⁹²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頁 306。

⁹³ 關於宋詩「語言之轉化」，詳參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頁 323。

⁹⁴ 如趙翼《甌北詩話》卷 6 稱楊誠齋：「誠齋專以俚言俗語闖入詩中，以為新奇」；陳衍《宋詩精華錄》卷 3：「作白話詩，當學誠齋。」以上轉引自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頁 326。

⁹⁵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145。

袁枚以牡丹詩為主題，遍舉唐、宋、元、清人的詩作進行縱向比較，以唐人牡丹詩「寫神」、「別有寄託」、「別有感慨」，而宋人牡丹詩則「俗矣」。若從其所列詩句來看，袁枚所舉宋人牡丹詩確實較為淺易，但只單舉一句，而非雙句引出，似未顯公道。從詠花詩題材的轉化來看，「由實用的功利意識跳脫出來，轉化為美感的鑑賞對象，是詠花詩題材化俗為雅的歷程」⁹⁶，袁枚所舉的唐人牡丹詩是以美感的鑑賞為主，所舉宋人牡丹詩就「要看一尺春風面」一句是很難見出端倪的，可見袁枚以唐詩為雅、宋詩較俗的說法仍有其偏見。此外，在這則記載中，袁枚列舉甚多清代詩人的詠牡丹詩，就其脈絡觀之，其重點應是在評論清人的牡丹詩，以為「足與古人頡頏」⁹⁷。足見袁枚辨唐宋詩之目的，多在批評今人，亦或提供今人習詩參考，而非責難古人，符合詩話教人寫詩的性質。

（三）性情厚薄之分

袁枚辨唐宋詩之別，還在於性情厚薄之分。《隨園詩話》有云：

近見作詩者，好作拗語以為古，好填浮詞以為富；孟子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朱竹君學士督學皖江，來山中論詩，與余意合。因自述其序池州太守張芝亭之詩，曰：「《三百篇》專主性情。性情有厚薄之分，則詩亦有淺深之別。性情薄者，詞深而轉淺；性情厚者，詞淺而轉深。」余道：「學士腹笥最富，而何以論詩之清妙若此？」竹君曰：「某所論，即詩家唐、宋之所由分也。」因誦芝亭《過望華亭》……《江行》……《端陽》……《太白樓》……《同人自齊山泛舟》……皆極淺語，而讀之有餘味。⁹⁸

⁹⁶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頁 316。

⁹⁷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145。

⁹⁸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487。

關於唐宋詩之所由分，袁枚曾藉朱竹君之口提出性情厚薄之別，因而詩便有所淺深。袁枚認為詩經三百篇皆主性情，但有性情厚薄之分。若性情多者，則詞淺而轉深；性情少者，則詞深而轉淺，袁枚以此為「唐、宋之所由分」。袁枚論詩主張詩本性靈，而所謂性靈，即性情也。越能表現自我性情，其詩越好。若從袁枚論唐宋詩風格來看，袁枚以宋詩「少情」、「少弦外之音」，可見應是以宋詩性情較薄，詞深而轉淺；以唐詩性情為厚，詞淺而轉深。重點在是否表現性情。若從「詞深而轉淺」、「詞淺而轉深」來看，可見袁枚不以詩歌語言淺白為病，並以清人詩句為例，以為「皆極淺語，而讀之有餘味」。

綜觀袁枚辨唐宋詩之異同，儘管未能盡覽唐宋詩異同之全貌，但可說是點出唐宋詩異同的諸多關鍵，諸如詩歌語言之別、用韻之別等等。袁枚辨唐宋詩異同的目的，主要是在批判今人，或是給予今人習詩參考之用，而非苛論古人。儘管其論詩有著宗唐取向，但卻無意高舉宗唐亦或宗宋的旗幟，而有意調和二者。從其唐宋詩比較觀之，以宋詩好用僻韻，唐詩絕不用僻韻；唐詩為雅，宋詩為俗；唐詩性情較厚，宋詩為薄之說，可見袁枚實有宗唐傾向，但仍舊力圖論詩之客觀，例如雖以宋詩為俗，卻仍標舉楊萬里一樣。事實上，《隨園詩話》尚載有其他顯示袁枚宗唐傾向的資料：

或稱予詩云：「專寫性情，不得已而適逢典故；不分門戶，乃無心而自合唐音。」雖有不及，不敢不勉。⁹⁹

有人稱袁枚詩專主性情，沒有門戶之分，卻隱然與唐音相合，是「無心而自合唐音」，袁枚自謙有所不及，但求勉力為之。可見就袁枚的詩歌創作標準來說，儘管「專寫性情，不得已而適逢典故；不分門戶」，但是以

⁹⁹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227。

合乎唐音為高。袁枚對於唐詩風格的評價無疑是較高的，以詩經國風與盛唐詩並稱為「詩之稱絕調者」：

凡藥之登上品者，其味必不苦：人參、枸杞是也。凡詩之稱絕調者，其詞必不拗：《國風》、盛唐是也。大抵物以柔為貴：綾絹柔則絲細熟，金鐵柔則質精良。詩文之道，何獨不然？余有句云：「良藥味不苦，聖人言不腐。」¹⁰⁰

袁枚以詩文之道「以柔為貴」，且「其詞必不拗」之說，無疑是站在唐詩風格上進行立論，其詩歌審美的最高標準是接近唐詩的，儘管袁枚明確主張「詩不分唐宋」。袁枚力主詩不分唐宋之意圖，也展現在其調和唐宋詩的具體策略上，袁枚如何「釋兩家之憾」？詳待後論。

叁、釋兩家之憾——調和唐宋詩之爭的具體策略

《隨園詩話》主張詩不分唐宋，其被視為調和派，出入於唐宋之間。袁枚試圖調和唐宋詩之爭的意圖相當明顯，其目的在於學詩之需要。總的來說，袁枚主張學詩以博覽為工，不專主一家之言，因而唐宋兼采，反對因襲模擬，且能顯現自我風格為最佳。《隨園詩話》有云：

楊龜山先生云：「當今祖宗之法，不必分元祐與熙豐也。國家但取其善者而行之，可也。」予聞人論詩，好爭唐、宋，必以先生此語曉之。¹⁰¹

袁枚舉楊龜山之語為例，在面對紛擾的論爭時，是以「取其善者而行之」為大要。面對時人在唐宋詩上的論爭，袁枚亦主張「取其善者而行之」，而非為門戶所限。為能達到其詩論主張，在唐宋詩之爭紛擾未休的時代，

¹⁰⁰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577。

¹⁰¹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215。

試圖調和唐宋詩之爭自然成其詩論的一個努力方向。袁枚調和唐宋詩之意圖，可從袁枚試圖調停詩友之間論詩的爭議獲得理解：

同徵友萬柘坡光泰，精于五七古。程魚門讀之，五體投地。近體學宋人，有晦澀之病。陳古漁專工近體，宗七子；故聞魚門贊萬詩，大相抵牾。余為作跋，釋兩家之憾，且摘柘坡近體之佳者，以曉古漁。其《題開元寺》云：「古樹鳥巢密，疏寮客到稀。」「鈴空隨瓦墜，碑斷入牆填。」《方鏡》云：「自笑相逢同柄鑿，封侯誰有面如田？」《金鰲玉竦橋》云：「曉來濃翠東西映，也算峨眉對仗班。」陳乃折服。¹⁰²

萬柘坡專工五七古，近體學宋人；陳古漁專工近體，宗明七子；一為宗宋，一為宗唐。當袁枚好友程魚門大讚萬柘坡詩時，便引起陳古漁之不滿，乃「大相抵牾」。這是一個明顯的唐宋詩之爭的案例，袁枚為「釋兩家之憾」，也為調停友人間的論爭，因而舉出萬柘坡詩近體之佳者以示古漁，學宋詩近體未必定有晦澀之病，只要「取其善者而行之」、「只論工拙，不論朝代」¹⁰³，唐宋詩之間並非水火不容。袁枚調和唐宋詩的方式，可從兩方面進行析論：一、從「轉益多師」論學唐宗宋的議題；二、從「不謀而合」論調和唐宋詩。

一、從「轉益多師」論學唐宗宋的議題

袁枚論唐宋詩之爭，在於「取其善者而行之」，因為認為唐宋詩各有千秋，各具擅場，不容人為軒輊。《隨園詩話》云：

人或問余以本朝詩誰為第一，余轉問其人，《三百篇》以何首為第一？其人不能答。余曉之曰：詩如天生花卉，春蘭春菊，各有一

¹⁰²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23-24。

¹⁰³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519，此處尚有一個袁枚調和唐宋詩之爭的例子。

時之秀，不容人為軒輊。音律風趣，能動人心目者，即為佳詩，無所謂第一、第二也。有因其一時偶至而論者，如「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一首，宋居沈上。……有總其全局而論者，如唐以李、杜、韓、白為大家，宋以歐、蘇、陸、范為大家是也。若必專舉一人，以覆蓋一朝，則牡丹為花王，蘭亦為王者之香。人于草木，不能評誰為第一，而況詩乎？¹⁰⁴

袁枚提到，詩有如天生花卉，各有一時之秀，不容人為軒輊。若以之論唐、宋詩之優劣，則表示唐宋詩各有千秋，不可強分等第。只要「音律風趣，能動人心目者，即為佳詩」。袁枚亦反對專主一家覆蓋一朝，如唐以李杜韓白為大家，宋以歐蘇陸范為大家，如此容易眼界偏狹，而不能兼取眾妙。《隨園詩話》又云：

詩人家數甚多，不可硜硜然域一先生之言，自以為是，而妄薄前人。須知王、孟清幽，豈可施諸邊塞？杜、韓排奘，未便播之管弦。沈、宋莊重，到山野則俗。盧仝險怪，登廟堂則野。韋、柳隽逸，不宜長篇。蘇、黃瘦硬，短於言情。悱惻芬芳，非溫、李、冬郎不可。屬詞比事，非元、白、梅村不可。古人各成一家，業已傳名而去。後人不得不兼綜條貫，相題行事。雖才力筆性，各有所宜，未容勉強；然寧藏拙而不為則可，若護其所短，而反譏人之所長，則不可。所謂以宮笑角、以白詆青者，謂之陋儒。范蔚宗云：「人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此大病也。」¹⁰⁵

袁枚認為古人各自成家，各有風格，不宜護短譏長，以白詆青，而應「兼綜條貫，相題行事」。袁枚所舉的詩人，從唐代的李杜到宋代的蘇黃皆包

¹⁰⁴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67。

¹⁰⁵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144。

括在內，可見其兼采唐宋，其風格殊異，後人宜應欣賞其「異量之美」，足見主張轉益多師、博覽為工。

既然唐宋詩各有其妙，不宜專主一家，究竟該如何「取其善者而行」？對此袁枚另有一番見解與主張：

詩雖小技，然必童而習之。入手先從漢、魏、六朝，下至三唐、兩宋，自然源流各得，脈絡分明。今之士大夫，已竭精神于時文八股矣；宦成後，慕詩名而強為之，又慕大家之名而挾取之。於是所讀者，在宋非蘇即黃，在唐非韓則杜，此外付之不觀。亦知此四家者，豈淺學之人所能襲取哉？於是專得皮毛，自誇高格，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作詩之要也。¹⁰⁶

袁枚具體指出學詩的徑路：宜從漢、魏、六朝入手、再至三唐、兩宋，如此始能「源流各得，脈絡分明」。《隨園詩話》載：「然近今士人，先攻時文，通籍後始學為詩，大概從宋、元入手，俗所稱『半路上出家』是也」¹⁰⁷，可知袁枚有意矯正此風，以唐宋兼采補之。就袁枚所列的學詩徑路，的確是博覽眾家，唐宋兼采，反對專主一朝一家之詩，而主張詩無常師。然而，袁枚並非主張不學大家，而必須擇其善者而從：

余嘗教人：古風需學李、杜、韓、蘇四大家；近體須學中、晚、宋、元諸名家。或問其故。曰：「李、杜、韓、蘇才力太大，不屑抽筋入細，播入管弦，音節亦多未協。中、晚名家，便清脆可歌。」¹⁰⁸

¹⁰⁶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118。

¹⁰⁷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76。

¹⁰⁸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237。

就學詩來說，袁枚主張「先學古風，次學近體」¹⁰⁹。古體宜學李、杜、韓、蘇等大家，近體則學中、晚、宋元諸家，因李、杜、韓、蘇等大家以才力勝，學古風此類格律較寬鬆的詩體更能學其妙；中、晚唐與宋、元名家則無此累，因而可學其近體。袁枚亦認為七律應學中晚宋元，而不學盛唐，亦是從詩體發展的角度觀之。由此可見，袁枚論學詩，主張打破門戶之別，唐宋兼采，為善是從。此種不主一家，轉益多師的言論背後，自然有著融通唐宋的意圖。

二、從「不謀而合」論調和唐宋詩

《隨園詩話》之調和唐宋，明顯地表現在呈現唐、宋詩「不謀而合」的部分。儘管論唐宋詩者多主其「異」，但是若從調和的立場觀之，袁枚亦從其「同」處立說。在行文上，袁枚往往列舉主題，再以唐、宋詩作為比較，使讀者瞭解二者之相近處。關於這方面的資料頗多，共有九則¹¹⁰，列舉數例如下：

唐人句云：「鄉心正無限，一雁度南樓。」宋人句云：「正思秋信到，一葉墜中庭。」古今人下筆，往往不謀而合。¹¹¹

唐人咏《柳》云：「長條亂拂春波動，不許佳人照影看。」宋人咏《柳》云：「愛把長條惱公子，惹他頭上海棠花。」¹¹²

富貴詩有絕妙者。如唐人：「偷得微吟斜倚柱，滿衣花露聽宮鶯。」宋人：「一院有花春晝永，八荒無事詔書稀。」……本朝商寶意云：「簾外濃雲天似墨，九華燈下不知寒。」¹¹³

¹⁰⁹ 清·袁枚，《隨園詩話》：「余常勸作詩者，莫輕作七古……初學詩，當先學古風，次學近體，則其勢易。」詳見《隨園詩話》，頁465-466。

¹¹⁰ 見清·袁枚，《隨園詩話》，頁34、68、71、91（二則）、140、212、236、319。

¹¹¹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212。

¹¹²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34。

詩有認假為真而妙者。唐人《宿華山》云：「危欄倚遍都無寐，猶恐星河墜入樓。」宋人《咏梅花帳》云：「呼童細掃瀟湘簟，猶恐殘花落枕旁。」有認真為假而妙者。宋人《雪中觀妓》云：「恰似春風三月半，楊花飛處牡丹開。」元人《美人梳頭》云：「紅雪忽生池上影，烏雲半捲鏡中天。」¹¹⁴

詩家有不說理而真乃說理者。如唐人咏《棋》云：「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咏《帆》云：「恰認己身住，翻疑彼岸移。」宋人：「君王若看貌，甘在眾妃中。」「禪心終不動，仍捧舊花歸。」《雪》詩：「何由更得齊民暖，恨不偏於宿麥深。」《雲》詩：「無限早苗枯欲盡，悠悠閑處作奇峰。」¹¹⁵

在這些資料可發現，袁枚往往先羅列主題，然後分舉唐人與宋人詩句作為比較，甚至及於元、清人詩句。若單從所舉唐、宋詩人作品來看，多是平行並舉，而非比較優劣，且是專就其內容而言，如咏柳詩、論理語、富貴語，皆在展現「古今人不謀而合」，亦或足以相互輝映之處。換言之，亦即唐宋詩不謀而合之處，其調停唐宋詩之爭的意味可謂濃厚。

袁枚主張詩不分唐宋，因而儘管我們可以理解袁枚的宗唐傾向，但基本上袁枚不刻意標榜，而是主張一種調和的立場，「取其善者而行之」。錢鍾書論袁枚詩非朝代的主張，以其有時認為唐詩較宋詩佳，而時又反之的立場略顯矛盾¹¹⁶。事實上，袁枚本有意抹去唐宋詩的優劣之分，唐詩並非全佳，宋詩亦然，其中更有兼善詩體之不同，因而不能單以一朝風格論之，而應做更細膩的討論。

¹¹³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68。

¹¹⁴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71。

¹¹⁵ 清·袁枚，《隨園詩話》，頁 91。

¹¹⁶ 詳參錢鍾書，《談藝錄》，頁 215。

肆、結論

本文探討袁枚《隨園詩話》與唐宋詩之爭的關聯。透過詩話中對宗唐祖宋、唐宋詩異同等議題的剖析，希望瞭解袁枚如何擺脫門戶之見，進而提出調和唐宋之主張。得出數點意見如下：

一、從《隨園詩話》論宗唐祖宋的議題來看，袁枚主要從今人學唐宋詩的態度入手，不直接論及唐宋詩之優劣，可見其「只論工拙，不論朝代」的詩學主張。袁枚批判明七子、王士禎皆是從其專主盛唐處入手，主張屏棄前見以論詩，不主張一家一派以立言，而主張學詩以博覽為工，反對因襲模擬古人。在論學宋詩與宋名家詩來看，袁枚是以「新變」的角度肯定宋詩，但卻未能形成另一套審美標準來看待宋詩的藝術風格，因而論宋名家詩時仍是以唐詩的標準來衡量，可知袁枚實是有著宗唐傾向。袁枚於宋詩家中惟欣賞楊誠齋，以其詩風白話平易，重視獨創，且「從江西入，從晚唐出」，頗與其調和唐宋的意圖相合，因而特別標舉楊誠齋。從袁枚對學唐、宋詩的意見觀之，可見袁枚是透過指出後人學唐、宋詩的缺失，進而調和前人對於唐、宋詩之「偏見」，最終則在鞏固自己「詩不分唐宋」的主張。此正是袁枚調和唐宋的一種策略。

二、綜觀袁枚辨唐宋詩之異同，儘管未能盡覽唐宋詩異同之全貌，但可說是點出唐宋詩異同的諸多關鍵，諸如詩歌語言之別、用韻之別等等。袁枚辨唐宋詩異同的目的，主要仍是在批判今人，或是給予今人習詩參考之用，而非苛論古人，亦非有意高舉宗唐亦或宗宋的旗幟。從其唐宋詩比較觀之，以宋詩好用僻韻，唐詩絕不用僻韻；唐詩為雅，宋詩為俗；唐詩性情較厚，宋詩為薄之說，其中可見袁枚實有宗唐傾向，但仍力圖論詩之客觀，例如雖以宋詩為俗，卻仍標舉楊萬里一樣。

三、袁枚調和唐宋詩之爭的意圖相當顯明，除了論宗唐祖宋現象時力圖批判詩分唐宋、辨唐宋詩異同則無意苛論古人外，袁枚更具體拈出如何調和唐宋詩之爭的方法，即轉益多師與不謀而合。袁枚以唐宋詩各有千秋，因而必須「取其善者而行」，此種轉益多師的態度背後正是調和唐宋的意圖。此外，袁枚更在詩話中有意識地呈現唐、宋詩「不謀而合」的部分。儘管論唐宋詩者多主其「異」，但若從調和的立場觀之，袁枚便是從其「同」處立說，以示古今人不謀而合，唐詩、宋詩並非楚河漢界，亦有相互類似或輝映之處，以此破詩分唐宋之說。若從理論之「破」與「立」觀之，《隨園詩話》論學唐、宋詩與辨唐宋詩異同是從其「破」處入手，而調和唐宋詩便是「立」處著眼，兩者共同構成袁枚唐宋詩調和論的兩大主軸。

四、透過本文所呈現袁枚如何調停唐宋詩之爭的詩論主張，可以看出袁枚詩論的「現實針對性」（嚴迪昌語），即是透過對現有詩學的論說進行解構，無論是學唐、學宋以及當時盛行的詩學議題，目的皆在闡述其詩本性情的性靈派主張。唐宋詩之爭作為清代詩學的一個重要議題，袁枚自不能置身事外。袁枚對唐宋詩之爭的諸多見解，可顯現他如何將「詩本性情」的性靈派主張，具體落實在「唐宋詩之爭」的詩學論爭上，進而得以與其他詩學流派如格調、肌理派有所區隔。其次，從清代唐宋詩之爭的流變觀之，透過本文對袁枚詩論的陳述，可以見出袁枚何以能在清代唐宋詩的論爭中取得融通的策略，進而能夠引領風潮，成為清中葉唐宋思潮融通的一個高峰。

徵引文獻

(一) 古籍

- 宋·歐陽修，《六一詩話》，見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冊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清·李重華，《貞一齋詩話》，收錄於丁福保編，《清詩話》，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
- 清·袁枚，《小倉山房詩集》，見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冊1，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見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冊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清·袁枚，《隨園詩話》，見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冊3，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清·袁枚，《小倉山房尺牘》，見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冊5，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二) 近人編輯、論著

- 方盛良，〈清代士商互動之文化原生態個案考論——厲鶚與「小玲瓏山館」〉，《文學評論》期4，2007年，頁114-120。
- 王英志，〈不相菲薄不相師——袁枚對王士禛的評價〉，《文史知識》期1，1996年，頁80-96。
- 王英志主編，《清代唐宋詩之爭流變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
- 周啟成，《楊萬里和誠齋體》，臺北：萬卷樓圖書，1993年。
- 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

-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臺北：洪葉文化，1995年。
- ，《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臺南：成大出版組，2000年。
- ，〈清初宗唐詩話與唐宋詩之爭：以「宋詩得失論」為考察重點〉，《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學刊》期1，2002年6月，頁83-158。
- ，〈清初宋詩學與唐宋詩之異同〉，第三屆國際暨第八屆清代學術研討會，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主辦，2004年3月13-14日，頁87-122。
- ，《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臺北：萬卷樓圖書，2004年。
-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盤庚出版社，1978年。
- 鄔國平、王鎮遠，《清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齊治平，《唐宋詩之爭概述》，湖南：岳麓書社，1984年。
- 蔡鎮楚，《中國詩話史》，湖南：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
- 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 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乾隆朝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
- 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出版社，1999年。
- 嚴迪昌，《清詩史》冊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